

微山党史资料

第二辑



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三月

微山党史资料

第 二 辑

中共微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编

目 录

出狱前后·····	张运海 (1)
开辟沛滕边抗日根据地·····	郑安良 (15)
忆主传珍同志·····	张精忠 (37)
访主传珍同志口述记录·····	(43)
关于我在沛滕边县委工作	
期间的主要情况·····	黄天明 (48)
郝子香同志的两封来信·····	郝子香 (54)
沛滕边县委第一个党员训练班·····	丁子久 (65)
回忆沛滕边县干部训练班·····	张建基 (70)
中共微山县党史大事记·····	(75)
来信选登·····	(140)
在沛滕边抗日根据地传唱的歌词·····	(146)
流传在微山湖区的抗战歌谣·····	(156)
抗战口号·····	(166)
一九四〇年春节沛滕边区	
群众张贴的春联·····	(167)
稿约·····	(168)
编后·····	(169)

出 狱 前 后

张运海

一九二一年秋天，我在三孔桥第九小学插班四年级读书。学校的柳务本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因受“五四”运动新思潮、新文化的影响，柳先生常向我们传播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他宣讲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时，总是感慨激昂，怒形于色。我四年级毕业时，柳先生调走了，我们这伙有了一定思想觉悟的青年也就失学了。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我们这伙失学失业的青年忧国忧民，甚感前途茫然。为寻求革命真理，我们便成立了“青年读书会”。不久，从国民党四十九军弃职的张天与先生（黄埔军校毕业）回到三孔桥老家。他因不满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便和我们读书会的青年结下机缘。他带回的许多进步书籍任我们选读。有了这个好条件，我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悟到了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三一年一月，张

光中同志来夏镇进行建党工作，这年七月，经张光中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月，又通过张天乌的关系，我在沙沟车站考取了铁警。我利用“铁警”的合法身份和铁路工人交朋友，进行秘密建党活动。我共发展了十一名党员。后来，有一个名叫申立功的路警，在徐州被捕。他经受不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可耻地叛变了，并出卖了我。徐州敌人按照申立功提供的线索，立即发报，叫设在浦口的铁路警察局逮捕我。那时，我正在乌衣警校学习，校方派我值勤。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客车从乌衣行至临城车站，我被敌人逮捕。第二天，把我押回浦口铁路警察局审问。敌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要尽了花招。我始终装作不懂啥是共产党，敌人只得暂停刑讯。

我被捕后，党组织非常着急，派郑安良、李成祥带着张天乌先生写的信，利用熟人关系去浦口监狱营救我。郑、李二人在南京四处奔走，可能因张先生弃职失宠，或因政治犯干系重大，几经辗转，毫无作用，只得转回。

在狱中我认识了一个看守，和我家兄重名，也叫张运昌。论祖谱我对他以大哥相称。有了这

班干系，他对我的遭遇也深表同情。在狱中，时常得到他多方帮助。一天，他环顾四下无人，小声对我说：“运海弟，他们准备把你押转徐州监狱，你看怎么办呢？你在徐州是否有熟人？我设法替你联系”。当时，我托他去给李成祥、郑安良送信，告诉郑、李二人来狱中叙话。当天下午，张领着李成祥来了。我先把张看守透给我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叫李去找徐州车站下“竹记茶叶店”店员吴步军。吴是夏镇南三八街人，是我的舅舅，以后有事就通过他联系。我们商定好以后，李成祥匆忙离开了监狱。

第二天，我被押到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部监狱。这里押着许多共产党人。其中有个叫冷其英的，我们认识。他是江苏省邳县人，被捕前，是徐、海、蚌特委委员。通过冷其英同志的介绍，我才知道我们党遭到大破坏，特委的同志和沛县一带的党员，大部被捕了。我已预感到，郑安良、李成祥在徐不光对我无济，且非常危险。当天夜里，我给舅舅吴步军写了一封双关语的信。让郑、李马上回家。

舅：

请转告表兄，我在徐很好，望家中不要

牵挂，唯天气寒冷，着其迅速返里，筹备棉衣御寒。

恭祝

健康！

甥 运海叩上

郑、李二人见了我的信，当天下午离开徐州回夏镇。

在徐州警备监狱，敌人审问了我两次。第一次我仍不承认是共产党。不知什么原因，敌人倒没严刑拷打我。但在收场时，警官却威胁说：“张运海！你的问题我们很清楚，你不要敬酒不吃，我们有办法使你老老实实在地交待。”当第二天再审问我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好象他们抓到一点什么把柄，我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就在我准备受刑的当口，突然，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面前。

“运海，你就招了吧！我什么都说了。”叛徒申立功哆哆嗦嗦地劝告我。“无耻！”我怒吼道，随即就保持缄默。往后，敌人就不再审问，判我十五年徒刑，押回南京监狱。

我们身陷囹圄，并不感到孤独、苦闷。难友们象亲兄弟一样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鼓励，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对共产主

义的信念毫不动摇。我们虽然遭受到非人的摧残，身体非常虚弱，但革命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强了。在同敌人斗争中，我们学会了讲究斗争方式，注意斗争策略。国民党南京监狱中关押的大都是政治犯、共产党员。通过难友们的交谈，我们发现一部分同志仅作为嫌疑犯而被逮捕入狱的，敌人并没有充分证据。狱中党组织就帮助这些同志写呈子，要求无条件释放。通过这一斗争，先后有十几个人被释放出去。有的人入狱时仅是同情革命的同志，出狱时却真的成为共产党员了。

在狱中，我们还进行了绝食斗争，要求去掉脚镣手铐。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同志，都带着沉重的刑具，行动十分不便，身体倍受折磨。我们派出代表，向狱方交涉，要求去掉刑具。监狱长总拿上峰规定，不可更改为由，对我们的要求不予理采。面对敌人的暴行，我们决定进行绝食斗争。头一天，全监狱戴脚镣手铐的同志一齐绝了食。第二天，为了声援这一斗争，其他难友也开始绝食。第三天敌人拎来了香喷喷的白米饭和白菜炖猪肉，想瓦解我们的斗志。我们连看都不看，回敬的是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连饿晕了的同志也跟着小声吟唱。雄壮的歌声在狱中

回荡……。第四天中午，狱卒照常拎来了白米饭和白菜炖猪肉。监狱长也来了。他那一副虚伪奸诈的面孔收缩着，无可奈何地摊开了双手，破锣似的哑嗓开了腔：“诸位听着，早上，监狱方面作了研究，决定答复大家要求，去掉脚镣手铐，不过，要规规矩矩，不许乱来，否则……。”大家不等他说完，一起“呸”了一声。共产党人干革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奈何以死惧之？！

斗争胜利了！难友们认识到：狱方是不敢饿死我们这些政治犯的。出了问题，他们不好向上峰交待，只好向我们让步。

怎样度过监狱中漫长的岁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息尚存，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斗争不止，监狱是新的战场，狱中党组织领导大家开展了读书活动。其方法有两种：一是自学，许多难友入狱时，把随身书籍千方百计带进了监狱。林振海、庞子标、管文慰、袁宗道等同志托亲友利用探监的机会送来了一部分书籍，大家轮流着看。在读书的时候，门口、窗下派上岗，狱卒一来就打手势，读书的同志就连忙把书藏起来，或者用“中央日报”盖在书的上面，狱卒一走，又

接着读起来。当时，我们读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论群众运动》等马列著作；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李大钊同志的《布尔什维主义》，《庶民的胜利》，《今》等著名文章，就是从《新青年》中读到的。

二是听讲。难友中知识分子很多，有些同志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很高。狱中党组织指派他们轮流举办专题讲座，讲完后再集体讨论。当然，主讲人也好，讨论也好，声音都小到最低限度，尽可能不让敌人听见。看守中有些穷苦出身的人，即使听到读书声也往往不加过问。一到他们值班，我们就放心地学习、讨论。有的看守，由于受到教育，有了觉悟，还主动向我们传递消息，提供情报，帮助我们办事。

后来，敌人为了分化我们，把我和部分难友押往南京反省院。说是反省院，实际和监狱一样，过的仍是监狱生活。我在反省院又结识了一批难友。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一件事，就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迫使蒋介石释放政治犯，敬爱的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同志、邓颖超大姐专门去南京反省院看望我们，迎接我们出

狱。周副主席讲了西安事变的经过，讲了统一战线的形成，整个反省院沸腾了。周副主席的讲话，赢得了难友们一阵又一阵掌声。我们这伙“坐穿牢底”的囚犯，一旦获得自由，见到了亲人，心情自然是激动不已。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我们出狱了。我在浦口上车时，又碰到了周副主席一行上车北去。在火车上，我的心情更加激动。猛然间，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跟周副主席去延安。我把心里的话告诉了同车好友孔子寿、李振海。他俩劝我不要这样做。孔子寿说：“周副主席在反省院时对我们讲过，希望我们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你还是回家乡，找到地方党组织，拉抗日武装，杀敌报国吧！”在浦口车站，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敬爱的周副主席，回到了微山湖畔的家乡——夏镇。

在夏镇，我找到了郑安良，见到了金子良。我知道，金子良在敌人对党大破坏的时候投敌叛变，当了特务。所以表面上和他应付，实际上，我时时处处提防着他。郑安良是和我一块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彼此，心照不宣，互相信任。这时我又想去延安。这次是安良同志说服了我。他说：“过去咱找不到党，不是先组织了‘青年读

书会’，张光中找到咱门上吗！现在咱还可以先干起来，一边干一边找党组织，咱们干着，会引起组织上的注意，党会主动找我们的。”郑安良同志的意见显然是对的，我的想法再次被打消。

怎么干呢？我和郑安良找到金子良，鼓动他在一起拉武装。我和郑安良趁机打入其内部。过了几天，我看到队伍里人员复杂，地痞、流氓、赌徒、恶棍，乌七八糟，什么人都有。我们就拉出自己的枪支，成立了“夏镇人民抗日义勇壮丁队”。表面上我们仍拥护金子良，不让他起疑，实则我们另立组织了。我们的壮丁队，大部分是我和郑安良同志动员进来的兄弟爷们，一举一动都听我们指挥。就这样，夏镇有了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我们一边干，一边积极找党。在这期间，金子良的武装几次送往国民党的部队里。我们却通过孙立堂同志在官桥车站西，老薛城里黄殿岗找到了渠玉柏同志。渠是我们的老同志，那时，他正在滕县南部拉武装。不久，滕县县委孙俊才、渠玉柏确定张学周同志专门和我们联系。后来，通过张天乌打听到苗宗藩、张光中二同志，他们正在沛县活动。张光中同志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老上级。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和郑安良

顶着刺骨的西北风，到了湖西宋庄碰到了李本智。李认识郑安良，通过李，找到张光中同志（原名张新亭），见到了张光中同志，我的革命引路人，悲喜交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连我这样的硬汉子，也居然热泪盈眶。叙完了离情和在家乡拉武装的情况，光中同志讲了当前的形势，交待了任务……

屋外的北风呼呼地刮着，天气异常寒冷，但我们的心却是热的。一盏小油灯映照着兴奋的脸庞。临睡之前，光中同志说：“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你们就来找我，我有事，就派人去调你们，好好干吧！只要民众发动起来了，抗战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从张光中同志那里回来后，我和郑安良等同志大张旗鼓地搞起了抗日救亡工作。我们的队伍，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人。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滕县沦陷，川军溃退，夏镇危在旦夕，人心恐慌。我们这支三十多人的队伍若硬要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比试高低，无疑是以卵击石。我们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办法与日寇斗争。在队伍转移的问题上，我们与金子良发生了分歧。乔宪武同金子良一伙，他们想拉着这支

队伍去找沛县国民党，我和郑安良则主张去找张光中、苗老大，双方争论不休，就要动武。队员们都是我们的穷乡亲，关键时候听我们指挥。金、乔二人一看寡不敌众，只好收场。后来，他俩投奔了顽军，我们却拉着队伍找到了张光中。在沛县中学我们又碰到了金子良、乔宪武。金子良说：“川军十万都抵挡不住日本人，就凭你们这十几棵破枪能打日本人吗？我们要去大后方，我劝你们还是跟着走吧！在国军里，或许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不比在这穷乡僻壤受罪强！”我对金子良说：“早就知道你这个孬种，鱼走鱼路，虾走虾路，你去跟国民党享福去吧！我们决心跟着光中同志在敌后打鬼子。”“运海兄，我这是为你好，你不听好言相劝，咱们只好分道扬镳了，来日你会后悔的。”金说完拱了拱手，和乔宪武一块走了。

在沛北我们进行了训练，重点训练军事和民族教育、气节教育。不久，我们正式成立了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人民抗日义勇队。张光中同志带着队伍进入鲁南山区，在滕县南塘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我在总队特务连中当班长。说来好笑，我这个班长一共只当了三天，站了两班

岗，张光中同志就派我回夏镇一带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我一到夏镇，就了解到民族败类刘凤林当了日本人的维持会长，作恶多端。日本人忙于大会战，临(沂)枣(庄)一线的兵力都抽到徐州。夏镇的日本驻军也被调走。我迅速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部，张光中同志就派二大队的渠玉柏等同志，由张运昌、孙立堂二同志带路，潜入夏镇。接着由朱兴科同志作向导（朱与南庄王志美关系很好，是拳友），深入敌巢，将刘凤林逮捕，押解南塘枪决；并以张光中同志名义出布告张贴各地，震惊了汉奸，鼓舞了群众。

台儿庄战役之后，日本军队二次进驻夏镇，再次成立维持会。开始，周玉旋当会长，刘效良当副会长兼翻译。后来刘效良看看时局对他有利了，仗着他会日本话，和日本人关系亲密，刘效良当了正会长，周玉旋改当副会长。刘效良接受了刘凤林的教训，当了维持会长后，主动找我们联系，和我拉关系。我们也将计就计，掌握了维持会。维持会要办什么事，我们不点头，刘效良就不敢干。我在夏镇向富户搞募捐，刘效良不敢过问。咱们山里部队有困难，我把募捐的钱交给老交通员秦明道。秦明道人老心红，办法多，他把钱

族在竹杆子里，领着我送往山里（详见《常青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派人向山里送粮、送款、送新战士，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做了一些工作。

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派主传珍同志来到夏镇开辟沛滕边区抗日根据地。主传珍同志来后，先住南庄张家河口张宝钧的场屋里，到了汛期，又住到王老大（王志成）船上。在很短时间里发展王志成、王吉善、李宝义、张化民、陈卓民、李昭义、杨鲁增、张用佩、叶怀田等同志入党。

这段形势发展非常好。夏镇周围几十里以内的村庄都行动起来了，组织了各种救亡团体，人民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各项号召一呼百应。

为了让刘效良所控制的夏镇维持会真正地为我服务，我们还成立了锄奸小组。我从山里带回来四支短枪，配备给锄奸小组。锄奸小组成员有：刘玉环、李玉清、冯星响、张运海、王吉善、刘德功、张新宽、王锡武、郑一鸣（郑安良）、黄克俭。开始有六、七个人，后来发展到二十多人，每人一支短枪，一辆自行车。锄奸小组专门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卖国贼，杀一儆百。

这一时期，汉奸就不敢做坏事。这支锄奸队，在抗日战争初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共沛滕边县委建立，主传珍同志任书记。从这以后，我就在以主传珍同志为首的沛滕边县委领导下，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起来。

以上是我在狱中和出狱之后的一段经历。

（根据口述整理，已经本人审阅）